

從慶典到反抗： 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

白永瑞*

導引

天安門廣場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中是和現代化進程過程有著特殊的實踐相聯繫的，其契機可以溯及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是熟悉中國史的人們可以簡單得出的推論。但是，我認為以前的學術界對於形成特殊的集體記憶的起源或者形成過程並沒有傾注特別的關注。人們關心話題從來只是集中在發生「六四事件」的天安門廣場上。

有一部記錄片向我們演示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主導層的形成和糾葛，從這部記錄片（那些形成和葛藤招徠的論爭）裏我們可以看到，¹ 與通過歷史的象徵或者儀式（ritual）持續的方法相比，² 糾明在此事件或者儀式裏參

* 韓國延世大學史料科教授

1 關於示威主導層，可以參考既寫成底本，又擔當助理導演的澳大利亞的中國學者 Gerami Barne 和被稱為「民主主義的女神」的柴玲之間的論爭。參考<http://www.nmis.org/gate>。

2 關於用此種方法的代表性研究，請參考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rey N. Wasserstor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in Jeffrey N. Wasserstor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estview Press, 1992)。

加的行爲主體，及其能動的作用的方法，更能有效地說明歷史的力動。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溯及五四時期的天安門集會的形成過程，研究其中的各種各樣勢力的競爭和妥協的方法，希望不只是單純的確認其起源，更重要的是糾明理解中國民主主義特質的起點。

北京皇城的正門，以「受命於天，安邦治民」的意義命名爲「天安門」，前邊的廣場在五四運動期間比現在的規模更小。³ 隨著北京政府的成立，總統府的門前，位於新華門旁邊的天安門廣場，⁴ 自然地就成爲人們請願的集結地。但是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又成爲各界民衆（其中心是學生）集會示威的場所，在這點上它又有了新的意義。即，不是所有的示威都在這裏舉行，（在對付帝國主義所招來的民族危機的狀態下）只有全國民規模的爭點所召開的集會示威才在這裏。因此被稱爲「國民大會」。也因而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民衆獨特的政治參與方式。所以，以下我對天安門集會不探討它是以一種象徵還是儀式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復活，而是關注於圍繞著這種集會的各種勢力。

在天安門集會上可以動員以學生爲主的民衆，這個事實，不是由組織產生的，而基本上是由救國意識（或者民族危機）而引發出大義的作用，並且在沒有代表此大義的機構的狀態下，組成代表國民的國民大會，這成爲慣例並一直延用下來。在這裏，學生們自發的日常組織和連繫網（比如說，在集會上揭竿而起的各種小組和學生會等）在後面支持著這個集會。像這樣學生們並不是從日常生活的利害關係，而只是從抽象的動機來參加集會，所以他們不可能成爲持續下去的運動體，集會散了以後馬上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此看來，用天安門集會來樹立起新政權，從一開始就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這可能是學生運

3 20年代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側，有很大的牌坊，南側有城門樓，所以中間的空地不是很大，4、5千名左右的人們聚集的話很擁擠。王善中，〈中國共產黨與「三一八」運動〉，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黨史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142。

4 天安門的左側西長安街上的新華門，是以在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以後，爲了誇示權威，在總統府設立了正門，被稱爲「新華門」。參考彊國，〈新華門今昔〉，《文史資料選編》，第8輯，1980年。

動的局限，但是對於揭露中央政府的不足，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上來看確是有效率的。

天安門集會的由來：民間慶典和政府活動

一般認爲天安門廣場從1919年五四事件開始被稱爲各界民衆示威的集會場所。但此種形式在當時是首創嗎？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以及伴隨著這個集會的街頭示威，實際上並不是有計畫有組織的，但我們可以假設到在這個集會以前，應該有一個既存的經驗讓學生們加以利用。

首先，我們可以追溯的是民間的提燈遊行。在官府的允許下，民間人士在節日的時候製燈，在大街小巷張燈結彩隨意往來，這種習慣是從很久以前就在北京流傳的。從陰曆正月13到17被稱爲「燈節」，這種氣氛甚至比元旦更熱鬧。隨著夜色的深入，無論商店還是住戶都爭先恐後地掛起燈，無論男女老少所有的人手裏都提著燈毫無顧忌地往來於路上。⁵

其次，我們可以推測的是爲紀念辛亥革命而舉行的活動。1912年滿清政府瓦解以後在天安門舉行的第一次慶祝活動是在1913年。換句話說，這個活動是「有史以來最初的共和國體政府」正式成立後的第一次國慶大典。大總統在太和殿舉行了就任儀式以後，於午前11點登上天安門進行了閱兵式。⁶ 1914年的紀念式有了更爲系統的體系，學生們也開始參加此種活動。⁷ 但是，這樣規模的紀念活動，從此以後幾年之內都沒有再舉行過。因國體的變動（推行帝制運動）發生了騷亂並因此沒能進行祝賀共和政體的成立，隨著袁世凱於1916年滅亡和1917年後的大總統舉行的閱兵式，都不是在天安門，是在軍隊的駐紮地。

5 《北京指南》，增訂四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第2編，禮俗，頁6。據李景武，《北平風土志》（臺北：中國文化學院風俗研究所，1967），頁89，其光景禮佛是西洋的聖誕節。

6 《大公報》，1913年10月10日、10月11日。

7 《大公報》，1916年10月12日；1917年10月12日。

⁸ 1918年連這樣的活動也不舉行了。⁹

在這兩種的經驗的混合之下，於1918年11月舉行了慶祝一戰勝利的活動。

¹⁰ 11月14日，在天安門舉行了由歐戰協濟會主辦的學界的勝戰祝賀活動。28日由北京政府正式舉行慶祝勝戰大會，在30日進行了提燈會。爲了準備這件事，教育部在21日召集了北京各專門學校以上的校長，做了具體指示，安排了行進路線，即經過議院和總統府，繞過各國公使館，最後到達參戰督辦段祺瑞住宅。¹¹ 這種以天安門爲中心向各國公使館區域擴散，直到城東邊的段祺瑞督辦住宅，這整個過程是一次官民協調一致的慶賀活動。¹² 參與過慶祝活動的學生們在5個月以後又重新復活了，但此種復活卻有了新的意義。與此同時，不但整個北京而且是全中國都沉浸在這勝利的氣氛中。然而戰勝國之間的交易和談卻背棄了中國人的期待，這使得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北京的學生的慶祝遊行變成了抗議示威。以前的慶典和以官爲主的天安門現在實現了一種新的民間參政方式，這具有一定的新意義。

天安門集會的新的意義：批判中央政府的場所

中國人在慶祝戰勝的同時，對列強國家在戰後的處理過程中的表現感到了巨大的失望。從巴黎和會傳來的消息，使北京的知識階層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他們義憤填膺，奔走相告，企圖迫使北京政府不承認巴黎和會中的講和條約。社會團體中的國民外交協會也闡明了他們的計畫將於5月7日（恰巧是國恥日）召開國民大會的計畫。但是在前一年進行過抗日請願運動的學生們認爲，如果

⁸ 《大公報》，1916年10月12日；1917年10月12日。

⁹ 《大公報》，1918年10月12日。

¹⁰ 〈北京學界遊行會誌盛〉，《大公報》，1918年11月15日。

¹¹ 〈未來之慶賀協商國戰勝大會〉，《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2日。

¹² 《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2日，〈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參觀記〉，《大公報》，1918年11月30日。

在5月7日召開大會的話，就來不及了。他們希望單獨進行集會和示威，表達自己政治上的見解，所以在3日的晚間各學校的代表們在北京大學舉行了預備會，並決定於4日在天安門舉行示威。天安門在5個月以前曾是學生們，慶祝勝利時，大規模聚集的場所，所以，他們決定以天安門爲集會場所對於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選擇。如果事態以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以及那段時間的街頭示威爲終止的話，那麼5月4日在歷史上不一定會受到多大的關注。所有的人都知道被逮捕的學生以保釋的形式被釋放了，但是這個街頭示威的消卻震動了全國。例如，僅僅在北京，學生們爲了徹底地達到自己的要求進行了強行示威，以6月3日的大示威爲高潮，之後持續的發展並擴散爲各界民衆參與的運動。也正因此，他們可以在6月10日這一天收到了3位官僚被罷免的消息以及28日拒絕在和會條約上簽字的宣言。

從其結果中可以推測出，當時新的政治參與方式已誕生了，通過這個方式各界民衆參加到政府的決策中來。當時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雖然因爲外交問題使政府合法受到了損傷，但是由此卻揭開了在天安門進行政治集會的序幕。我們應該重視這個特徵，因爲這個示威的形式由此成爲北京所有此種政治集會的雛型。即政治上的爭點一經發生，就使民間的各個團體在天安門舉行大規模的國民大會，並伴隨之進行了街頭示威來宣傳他們政治上主張的合法性（legitimacy）。在大會和示威中的主流仍舊是學生。

從宏觀上來講這種形式一直維持到20年代，但是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所獲得的新的合法性卻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評價。比如說，當時的梁漱溟以現行的國家法律爲基礎批評示威的學生，但當時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們以市民社會的合法性和現行法律的不恰當性對他進行反駁。這個事件表明對於當時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問題認識是多角度的。¹³ 但是我們不可忽略的是天安門集會的合理性不是

¹³ 梁漱溟，〈論學生事件〉，《每週評論》，1919年5月18日。這篇文章是刊登在《國民公報》以前揭載的。其反論是知非〈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每週評論》，1919年5月18日以及〈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每週評論》，1919年5月18日。這兩篇文章全部是再刊登的。因示威被逮捕來受裁判的學生們的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的批判，從被拘留者許德珩等32人的面臨法庭時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五四愛國運動資料》，頁169-70。

通過這些過程獲得。天安門集會不是突然地確保了它新的合法性地地位的，而是通過不斷舉行的集會和示威在與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競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他們自己的合法性的。

1919年11月的福州事件中天安門集會可以被認為是此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1919年11月16日在福建省的福州市學生們展開了排斥日本商品的運動，但遭到了日本領事的襲擊。這個事件馬上引發了全國性的民族運動。特別是在五四事件的發源地北京以夏季為分水嶺使得漸漸冷卻的學生運動再次活躍起來，11月29日和12月7日在天安門又召開了集會。¹⁴ 此次天安門集會也大致類似於上一年5月的集會，由民族問題引發的以族的大義為名份，以展開了學生為主力的請願和集會和示威。當局對其維持旁觀的態度。但是這些集會也被賦予新的內容。從一開始此次集會和示威在前面就明確地闡明了代替辯護各界輿論的「國民大會」的形式，代表們召開露天會議並討論示威日程和行動方針等。示威路線也被擴展出來了，甚至有往返城外的變化。這大體上是從1919年5月6月運動經驗中總結出的結果，我認為特別是北京學生聯合會。北京各界學生聯合會的組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這次集會比5月的具備了更完整的體系。這意味著今後天安門集會的一種「慣例」出台了。

天安門集會的激進化：追求新的政治權力

然而直到20年代的後半期在天安門幾乎沒有舉行過什麼集會。在1920年1月有一次集會，¹⁵ 在2月4日和2月6日有過開集會的企圖但卻沒有成功。¹⁶ 在

14 〈國民對於閩事之憤潮〉，《大公報》，1919年11月27日；〈閩事昨聞種種〉，《大公報》，1919年11月29日；〈昨日北京學界因閩事大遊行〉，《大公報》，1919年11月30日；〈關於閩事之昨聞〉，《大公報》，1919年12月4日、12月5日；〈昨日之國民大會〉，《大公報》，1919年12月8日。

15 〈昨日北京之學界〉，《大公報》，1920年2月1日。

16 〈昨日之學潮〉，《大公報》，1920年2月6日；〈學生團大活動〉，《順天時報》，1920年2月6日；〈被拘學生昨全釋放〉，《大公報》，1920年5月25日；〈政府嚴勵防止學潮〉，《大公報》，1920年2月7日；〈漸歸平靜之京學潮〉，《大公報》，1920年2月10日。

此期間例外的是1922年10月的「裁兵大會」。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隸派取得成功之後，吳佩孚一掌握北京政府力求「通過法統的統一」，隨之出現了反響。北京的學界期待著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一方面提出「好人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召開了要求裁兵的盛大集會。¹⁷ 在這期間，1923年夏季的北京政變曹錕腐敗選舉等，當然有很多爭端可能招徠國民敏感的反應。但是在天安門幾乎沒發生過集會。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政府對於集會和示威改變了以前旁觀的態度，進行強硬的鎮壓。所以，為了了解裁兵大會成功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當時很短時間裏北京政府採取的妥協方針。¹⁸

但是在這段時間的天安門集會中，我們可以看出與以往的天安門集會和示威有明顯的不同。其一是參加的成員更廣泛了，有各種新的團體（特別是共產黨界的），還有不光是外交問題即便是國內政治也可以成為集會的名義。這一煥然一新的面貌顯示出天安門集會象徵並不僅僅是為民，是為政治集團以及某種階級利益也可以舉行集會。¹⁹ 特別是國共合作的成立，促使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學生們以自我開發爭論來批判北京政府的新的形象出現了。1923年5月1日在天安門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大會就是這樣一個事例。²⁰

這些新的因素破壞了長時間的停滯造成天安門集會的急進化。這是在另一次民族危機上造成的，即從上海傳來的五卅運動的消息。從1925年6月1日北京

17 〈今日之國民裁兵示威運動〉，《大公報》，1922年10月10日；〈國慶之國民裁兵示威運動〉，1922年10月12日、13日以及〈今日之國民裁兵運動〉，《順天時報》，1922年10月10日。

18 北京政府一邊公開允許集會，但一邊，像抵制北京附近的長辛店的鐵路勞動者們的參與一樣，對其進行了牽制。請參考《順天時報》，1922年10月10日。

19 關於為了在北京政府內的派閥鬥爭中占據有利的位置，在天安門上要借國民大會的名義的各種勢力的動態，看〈天安門之國民大會〉，《大公報》，1922年11月26日；〈昨日國民大會之內幕〉，《大公報》，1923年6月9日。

20 關於這次集會大公報的記者分析「北京各團體聯合會是數個月以來政府在外交內戰中沒有特別的錯誤，所以借這次機會在天安門上召開了集會」。〈昨日天安門之五一紀念大會〉，《大公報》，1923年5月2日。

報紙報導了此事，北京的學生爲了支持上海學生作出了迅速的反應。²¹最終在6月10日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國民大會。²²

北京政府也沒有什麼正當理由來限制這次天安門集會。上海的熱浪和全國的呼應讓北京政府感到無可奈何的政權危機。此後，天安門集會在酷暑的北京持續進行了兩個多月。

在1925年6、7月召開的天安門集會表面上看起來和以往的大會類似，事實上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市中心行進的範圍被擴展到了東西南北的全城。在6月14日的天安門集會上，北京學聯會的代表孫光宇以主席的身分在報告開會的目的的時候說「以前的示威由於側重於東城因此成了以請願爲主，但這次要以東西南北全方位示威進行來喚起市民的注意」，²³由此可以看出集會的指揮部希望通過更廣泛的宣傳煽動來改變集會的性質。²⁴其次，由於自由討論的導入，天安門集會逐漸顯示出它的民主性來。另外，不僅是參與頻率大幅增加了，同時也出現了勞動者踴躍參與的現象，但是爲明顯的特徵還是兩個月期間集中出現的集會次數。

1922年10月的裁兵大會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集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天安門集會的形式中添加過來的這些新因素是因爲1924年11月北京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原來就缺少合法地位，國民黨以國民會議運動爲替代政權出現了，國共雙方人士積極運作使五卅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新的要素一經顯現，集會的性質就向急進化的方向發展。確實，在幾個月後的11月的集會上（像下面寫的一樣）獨立政權的構想被提出來了。

21 〈國內專電〉，《大公報》，1925年6月7、8日。

22 〈國內專電〉，6月11日。

23 〈國內要聞〉，《大公報》，1925年6月15日；〈昨日天安門兩露天會〉，《順天時報》，1925年6月15日。

24 在北京市內東西南北地域的居住民之間的差異，可以參照李景武，《北平風土志》，頁17—18。

但是這樣的變化同時也包含了問題的所在。因爲在很短的時間裏不斷召開集會，集會的象徵很容易地變成爲日常性的了，並且出現了脫離以往集會的慣例的現象。²⁵加之，北京政府在上海跟帝國主義進行了妥協之後，已經不可能對天安門集會袖手旁觀了，²⁶因此集會很難繼續存在下去了。此時爲了重新調整不平等條約體制在10月召開了關稅會議，這個會議一召開，天安門集會就進一步急進化了。

10月25日和26日國民關稅自主運動大會在天安門上召開了，跟以前大不一樣，警察和示威隊伍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隨著衝突的加劇，集會的爭點越來越鮮明地指向了反對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的軍閥政權。終於在28和29這兩天裏樹立起了替代北京政府的革命政府的旗幟，使事態一發展到絕頂。²⁷這兩個日子裏的集會顯示了很多以前沒有的式樣。首先應該注意的是以學生爲中心各團體聯合的集會結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在這次集會上，國民黨在政治上作出的籌劃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次，從外表上看，可以看作是「暴動化」。但，無論如何，它沒有僅僅停滯在以往的對北京政府的批評的水平上，而是上升到力主集會的合法性以此來替代北京政權本身。也就是說，立志於樹立新政權。因爲我們從以前的敘述上確認了五卅運動以來天安門集會日趨急進化，所以當然不能說這次「首都革命」是突發的事態。但是，六，七月兩三個月裏發生如此頻繁的集會光從集會本身上的因素來說明那也是很不充分的。因爲兩天之後

25 一位清華大學生對於既沒有紀律又沒有信譽，只是「在天安門上設立舞台」的示威學生有所批判過。自昭，〈論遊行示威〉，《清華週刊》，24卷3期（1925年9月25日），頁138-139。從同樣的脈絡上，秋學期開始，在知識層中關於學生的現實參與問題展開了「求學」或者「救國」的論爭。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白永瑞，〈中國現代大學文化研究〉，一潮閣，1994年。

26 政府從6月30日的示威開始干涉。參照在這個日子的《順天時報》記事。

27 〈昨日各界又大示威〉，《順天時報》，1925年11月29日；〈市民迫段祺瑞下野〉，《晨報》，1925年11月29日；〈國民革命示威運動〉，《順天時報》，1925年11月30日；〈昨日之國民大會〉，《益世報》，1925年11月30日。

的天安門廣場又回到了日常的街景，從外表上看沒有什麼成果。²⁸ 在這裏，我們的興趣自然轉向於天安門集會的這些新的面目對於其合法性起了什麼影響。關於此問題在上面已經略微的展示出來了，國民大會在性質上被添加了政黨的因素，讓以往集會的合法性發生了轉換。這個新的因素產生不可能不與以往的集會慣例發生衝突，而為了克服這種衝突就要確保動員民衆的形式。並且，更重要的是集會方式的變化意味著舊有的框架已經變成新的框架，這就是革命。但是，這個轉變在當時並沒有被充分的樹立起來，所以一直處於矛盾的狀態。即一方面要依存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另一方面要利用以往天安門集會的合法性以及框架（就是國民大會）。²⁹ 充分地表現這一矛盾來的時期就是在3個月之後發生的三一八事件上。在此事件中死亡47名、負傷154名，這樣大的犧牲是向知識階層宣告「恐怖時代」的到來，是前所未聞的慘痛。追糾此事的責任所在，在政府當局和主導示威層之間發生了爭論。

在此爭論中引人注目的是集會指揮部的「道義上的責任論」。迄今為止領導天安門集會的指揮部是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京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們構成的。但這種機構不是常設的而是每次發生外交問題才臨組成的協議體，聯合會事實上也是以學界爲主流的。³⁰ 以學生的聯結爲基礎再加上學界名流的協力，是在當時已經公開的事實。然而改組以後的國民黨注意到青年運動以後，特別是在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集會的指揮部性質發生了變化。又加上，在國民黨內存在著好幾個派系，這些派系在五卅運動以後發生了糾葛，所以這樣的事情當然會影響到天安門集會指導層的內部。這種組織主導的天安門集會，對普通人來說，不是由國民大會而是由「黨爭」所產生。因此對集會的合法性本身就可以

28 據〈昨日所聞之國立各校消息〉，《順天時報》，1925年12月3日的報導，包括北京大的大學們已經歸於正常的生活。並且實在是，在11月和12月這兩個月中沒有一次發生過集會。

29 對國民黨一直有批判論調的《順天時報》的社論從自己的政治上的立場來強烈批評這個矛盾。論說的扼要是集會應該以像從來的一般性的「國民運動」爲止，不是這樣，國民黨利用集會顯示「黨爭的色彩」的話，那政府也有理由干涉。〈二十八九日之示威運動〉，《順天時報》，1925年12月2日。

30 〈學潮——宦潮〉，《大公報》，1923年3月6日。

提出懷疑。當時的北京政府也當然理解這件事情，因而可以驅逐天安門集會的指導者於「赤化」勢力。我們可以看出，在天安門集會上爲「革命」和「討赤」這二者理念所構成的新的對立結構已經登場。

慶典，天安門集會的復活？

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以後在天安門廣場沒發生什麼集會。在此之後的兩年，1928年7月7日的午前9時，儘管天氣酷熱，但仍有兩百個團體六萬餘名以上的人士雲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召開集會。即「北伐勝利歡迎革命大會」。在天安門上設置了主席台，圍繞主席台四周放置了演講台，在每個講演台上飄揚著國旗和黨旗，在這周圍是孫文總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主席台以市黨部委員、總商會、學生聯合會、總工會和婦女協會等代表們組成。集會的順序是以放禮炮爲宣布會議開始的，之後對黨旗、國旗及總理遺像進行三鞠躬，三分鐘的默哀，接著主席宣布會議目的的報告，講演，臨時表決，口號提倡，奏樂之後，就解散了。

因爲人們站很長時間，又沒有街頭示威。因此在天安門的前面燃放了爆竹。民衆歡呼著在街上互相擁抱。晚上，舉行了各個團體參加的提燈會。首先是參加的群眾在天安門聚會，之後進入中央公園，再次從公園後門走出經過西四牌樓，到達東單牌樓再返回天安門。沿途上歡呼口號，在天安門和中央公園一帶燃發了禮花，大會以此構成了壯觀的景象。³¹ 1928年7月的「歡慶北伐勝利大會」裏重現了1918年的「慶祝勝戰」慶典的慣例。官、民一起舉行了活動和蓮燈隊伍的並行。換句話來說，天安門集會的意義不僅是批判北京政府合法性，也有慶祝新政權的意義。但是，蔣介石政權進入北京城以及天安門廣場的慶祝活動也不可能賦予那個政權以合法性的保證。³² 蔣政權的合法性被擺在實

31 以上的內容幾乎完全是取材於當時記事的要略〈昨日天安門前之市民慶祝大會〉，《順天時報》，1928年7月8日。

32 在北京，閻錫山軍的一部的商震部隊一入城，馬上就從6月8日上午11時開始舉行變換青天白日旗的「易幟」的活動。〈北都易幟記〉，《大公報》，1928年6月10日。

驗台上。但是新政府的首都很快從北京轉移到了南京，因此天安門集會此後就失去了以往對中央政府進行批判的空間潛力。

50年代以後天安門廣場被擴展成建國慶典活動和閱兵式的場所，成為強有力的社會政權的象徵。到了80年代，在五四時期形成的對權力進行批判的作用又重新復活了。具有雙重象徵的天安門廣場也重新進入了又一個競爭的過程。

從「五四」對德先生的追求 論當代中國的民主發展

高永光*

「德先生」與「賽先生」是五四運動時兩個最響亮的口號，「德先生」是對「民主」的追求，「賽先生」是對「科學」的追求。「五四」運動從單純地對帝國主義的不滿，以及對當時政府主事者無能的示威、抗議運動，演變成當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從代表民主與科學的「德」、「賽」兩位先生的口號，就可以看出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癥結。同時，也指出了近代中國努力的兩個目標。

民主與科學這兩個目標，比較之下，科學的目標是比較沒有爭議的，科學主義的定義，或者在科學與人生，科學與哲學，甚至於科學與政治間的關係，當然有很多爭論的空間。¹但是，從技術層面來看，若只涉及物質條件的改

*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教授

1 五四之後中國發生了科學與玄學的人生觀的論戰，這是把五四提倡科學極端化，認為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這種科學主義自然會引起爭議，否則如果只是講究自然科學的發展，及把自然科學的發明或發現運用到人類社會，爭論自然不會太大。見韋政通，〈科學、民主與反傳統：以「台灣經驗」反省「五四」〉，《中國論壇》，第327期。此外參考，金耀基，〈科學、民主、現代化——為『五四』六十週年寫〉，《海外學人》，第83期，民國68年6月。